

## 差异的“东方”与“内部”的关联

——东方文化比较研究

徐新建

### 主持人语

上世纪90年代，当赛义德以后殖民立场强调“东方不是东方”的时候，他所说的东方依然不是中国人熟悉和自认的区域<sup>①</sup>。对于特定人群世代生存的故土，方位的划分总是出于划分者自身的起点和目的。近代以后，由于欧洲的强势，世界被其按照自我标准划出了远近高低甚至重新命名。在“西方”（the West）作为自称的同时，其余均被统称为西方的负面或“非西方”。于是原本各有其名只不过在地理上位于东部、文化传统上也异质于己的“东方”（the East），也就被生产了出来。怪异的是，随着时光流逝，被别人视为“东方”的这些区域和人群也渐渐习惯于此，开始以“东方”自居、自傲，并且卷入与“西方”的交往与对峙之中。

问题在于，难道真有一个确切、完整的“东方”么？如果有，其在哪里？是什么？

本专栏以“东方文化比较研究”为题，包括了三篇论述，即尹锡南的《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》、陈丕的《中朝文论关系比较》和邱明丰的《中日诗话的影响与比较》。作者从各自的角度通过对印度及中朝、中日的对照关联，呈现出另一种“东方”景象。这景象不同于实为“近东”与“中东”的阿拉伯世界，也没有生造出另一种完整统一。相反，即便在这已被相对地称为“远东”和“南亚”的非西方区域里，实际上也彰显着突出的“内部”差异。古往今来，它们间的彼此距离与多元张力，在某些方面甚至大于所谓的东方和西方。只是在近代之后，随着世界在实践和认知上的西方化，人

<sup>①</sup> 参见[美]爱德华·W·赛义德：《东方学》，中译本，王宇根译，三联书店，1999年版。

们——包括“东方人”自己，对于“东方”的了解愈发模糊和空洞。中国官方和民众，更是随着以天朝至上为前提的朝贡体系瓦解而日益陷入两极式的“中西对比”之中，从而对非中非西的旁人邻里不是视而不见就是鲜有提及。

这种令人遗憾的眼界与心胸当然难以长久。眼下，在全球视野和多元主义的影响下，通过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倡导和践行，国人不但重新强调所谓“东方”的文化本源，并且关注“东方”在国别、地域乃至古今和族群间的内部差异与连接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一种新的转向。其既有利于局部的“东方”，也有助于人类的整体。说其有利，理由很多。其中一个是对全球认知的拓展，因为站在之间者的角度看，“东方”是一个世界，“东方”在世界之中，东方就是东方。